

## 中國最早華文日報新史料的發現與研究——

### 有關「香港船頭貨價紙」及「香港中外新報」的考究

卓 南 生 \*

「《香港中外新報》創刊於1858年，是中國第一份近代化的日報」，這幾乎已經成為中國報史學界公認的“定論”。（註1）

但是，早期的《香港中外新報》是怎麼樣的一份報紙？何以見得該報是創刊於1858年？該報是在何時改為日報的？……

針對上述問題，報史學者所知的並不多，一般只能引述或根據中國報史權威戈公振1927年出版的《中國報學史》的看法。其實，戈氏對早期《香港中外新報》的記述，只有兩段。第一段是：

「我國現代日報之產生，亦發稿於外人。蓋斯時商務交涉日繁，其材料非雜誌所能盡載也。香港之孖刺報，于民國前五十四年，（咸豐八年）即西歷一八五八年，由伍廷芳提議，增出中文晚報，名曰中外新報；始為兩日刊，旋改日刊，為我國日報最先的一種。」（註2）

這段敘述給人的印象是：孖刺報所辦的中文報，一開始就命名為《中外新報》，初為“兩日刊”（正確的說法，應該是周三次刊），不久後改為日刊。

《孖刺報》所辦的中文報，最初是不是命名為《中外新報》？該報是不是在創刊之後不久，“旋改日刊”？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

《中國報學史》對《中外新報》的第二段敘述，則先肯定《中外新報》為《孖刺報》之中文版，接著指出西人辦中文報之不易，「故名為孖刺報所有，實為華人單獨主持

---

\* 作者現任新加坡聯合早報論說委員兼東京特派員，與社會學博士

（日本立教大學社會學研究院攻讀新聞學後博士學位）

，所有一切營業權利，皆屬華人，而《孖刺報》只每年享有若干權利，以為報酬而已。」（註 3）至於互惠條件，戈氏指出：「大約孖刺報之店而及機器鉛字，供中外新報之用，不取租值，只取印刷工價。《中外新報》則登載《孖刺報》所招來之西人廣告，亦不取費。此為清末時事，創始時是否如此，則不得而知之矣。」（註 4）

「創始時是否如此，則不得而知之矣」，充份地反映了戈氏在撰寫這段早期報業史時第一手資料的缺乏。後來的報史學者在敘述這段報業史時，幾乎都沿襲戈氏的舊說，也足見他們同樣面對資料短缺的難題。正因為無法找到早期的香港《中外新報》，戈氏《中國報學史》有關《中外新報》（注意！報名已省略“香港”二字）的電版插圖，是 1912 年出版的報紙（註 5），而不是十九世紀五十年、六十年代或者七十年代的早期《香港中外新報》。這份 1912 年的報紙在其報名之下，寫著“戊午年始創”的字眼。“戊午年”是西歷 1858 年，這也許就是戈氏主張該報刊於 1858 年的根據。《中國報學史》刊登的《中外新報》的插圖後來也常轉錄在其他有關中國報史的書籍（註 6），足見早期《香港中外新報》之不易覓獲。

《香港中外新報》被議為是中國第一份“現代日報”，在中國報業發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但人們對它的了解卻是如此的貧乏，這未免是一件憾事。為了了解早期《香港中外新報》的真正面貌，為了揭開這份第一家中文日報的謎底，筆者曾向歐、美、日本及其他各國博物院、圖書館及私人收藏家，探求有關的資料和線索。經過長期間的調查，終於發現到不少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其中包括：

1. 1872年5月4日（同治十一年壬申三月二十七日）之《香港中外新報》，這是目前筆者所能看到的最早的一份《香港中外新報》。它比收錄於《華字日報七十一周年紀念刊》1873年6月4日的《香港華字日報》（註7），還早一年又一個月。
2. 1859年間由香港《孖刺報》出版的《香港船頭貨價新聞紙》，共78份。

除此之外，在幕府末年流傳於日本國內的《香港船頭貨價紙》的手抄本、日本“洋書調研”出版的《官板香港新聞》（1861年至1862年，共二卷）以及吉野作造氏所藏的日文版小型本的《香港新聞》紙（1068-1077）（註 8），對於了解《香港中外新報》早期的面貌，無疑都是寶貴的間接資料。

現在，謹將筆者上述資料的看法和研究心得，分述於下。

## 一、1872年5月4日出版的《香港中外新報》

正如上面所述，1872年5月4日出版的《香港中外新報》是目前公私圖書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香港中外新報》。它的內容與形式，和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的《香港華字日報》（1873年6月4日，收錄於《華字日報七十一周年紀念刊》，1934年），大體上相同，共有四頁：

第一頁：全版為“香港目下棉紗花疋頭染貨行情沽出貨”，即商業行情的新聞。

第二頁：右上角為“本館謹啓”（即“本報啓事”），接著是“本港新聞”、“洋城新聞”（即“廣州新聞”）、“選錄上海新報”、“選錄京報”。

第三頁：除了續未完的“選錄京報”之外，盡是廣告。實際上，在該頁的上面，就寫著“來往商船”，可見該頁（版）的內容是以“來往商船”的商船廣告為主。

第四頁：上面寫明為“各款雜錄”，即雜錄各式各樣的廣告。

在該頁的下面，則寫著“此新聞紙係由香港孖刺報館卑里刻印”，清楚向讀者表明該報是由香港的《孖刺報》（即Daily Press）印刷。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頁（即封面版）的右上角，寫著“一三五行情紙，二四六新聞紙”（即星期一、三、五發行“行情報”，星期二、四、六發行“新聞紙”）。所謂“行情紙”，只是著重報道行情、貨價之起落；“新聞紙”才是真正報道新聞的報紙。1872年5月4日的《香港中外新報》表明該報每周二、四、六出版，可見當時該報仍然不是日刊，而是每周出版三次之的報紙。

這項說法正與香港當局發行的《香港藍皮書》（Hong Kong Blue Book）的記述相吻合。因為，直到1873年，《香港藍皮書》對《孖刺報中文版》（The Chinese Issue of the Daily Press）的記述，仍然是“每周出版三次”（"Thrice a week"），直到1874年版的藍皮書，才註明該報為“日刊”（"Daily"）。換句話說，該報之成為“日刊”，是在1873年以後的事。由此可見，《香港中外新報》並不是像戈公振所說的“始為兩日刊，旋改日刊”，而是“始為周三次刊，十餘年後改日刊”。

至於“行情紙”之“每日另紙刊印派送”（除禮拜日外），也是在1872年5月4日以後的事。有關這一點，同一天的《香港中外新報》在第二頁右上角的“本報謹啓”，有著進一步的說明：

「時事所以廣見聞，行情所以便商賈，本館於行情貨價一節，極意採訪，蓋期於貿易場中同人獲益也。惟向來出於新報之日，其行情款項則附於新報紙中，此亦為便覽閱起見也。然而事各有所見，近閱新報之客商，多有請於本館者，謂貴館於行情一款，間日則附諸新報紙內，似未便纂覽，蓋為改轍焉。茲本館因願商情，不惜工資，嗣後將行

情貨價等款，除禮拜日外，每日皆另紙刊印派送，不附登新報。特此以聞，尚其其垂鑒。」

這則啓事說明該報一向十分重視商業新聞（“於行情貨價一節，極意採訪”）“新聞紙”發行當天，固然刊登“行情款項”，在“新聞紙”不發行的日期，也發行“行情報”（“一三五行情紙”）。換句話說，該報在實際上每一都向其讀者（相信不少為“貿易場中同人”）提供行情、貨價等商業新聞。不僅如此，為了照顧“商情”，該報還決定一改過去的作風，不惜工資，在“新報”（指《香港中外新報》）發行的同一天，也另紙刊印和派送“行情紙”，而不像過去一般，附刊於“新報”。

這一來，《香港中外新報》實際上是每周二、四、六發行“新聞紙”，每天（禮拜天除外）發行“行情紙”。該報重視“行情紙”甚於“新聞紙”，充份地反映了該報“商業性報紙”的特性，也說明該報的讀者群是以商戶為主。“行情紙”先以“一三五”一周三次發行，改為周六次刊印派送，其實也是替該報以“周三次刊”轉為“日刊”製造有利的條件。可以這麼說，“行情紙”的每日發行，是《香港中外新報》以“周三次刊”轉為“日刊”的一個過程。事實上，就在“行情紙”每日發行後的第二年（1873年），《香港中外新報》也以日刊的姿態出現了。

另外，1872年5月4日的《香港中外新報》“為該報的”第二千二百五十六號”，由於該報每周出版三次，往後推算，其創刊應在十四、五年前，即1857年或1858年。

這個看法與戈公振的1858年創刊之說頗為接近。不過，值得注意的是，1872年5月4日的《香港中外新報》並未像戈公振《中國報學史》插圖的《中外新報》寫著“戊午年始創”的字眼。由此可見，這些文字是後來加上去的。也許，後來的主持人在將報名《香港中外新報》換為《中外新報》時，為了表示歷史悠久，而加上去的也未可知。因此，單以該報1912年註明“戊午年始創”，並不能肯定該報一定是在“戊午年”，即1858年創刊。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先得出如下的結論：《香港中外新報》為香港英文日報《孖刺報》（即The Daily Press）所辦，約在1857年或1858年創刊，初為周三次刊，後改為日刊。在改為日刊之前，每周二、四、六出版“新聞紙”（即“新報”），一、三、五發行“行情紙”；1872年5月4日以後，二、四、六發行的新報不再附錄“行情紙”，而改為“行情紙另行刊印”。這一來，《香港中外新報》實際上是每日（禮拜日除外）發行“行情紙”。至於“新聞紙”則照舊每周出版三次。第二年，也就是1873年，《香港中外新報》終於發展成為日報。時在該報創刊十四、五年之後。

## 二、《香港船頭貨價紙》（1859年出版的78份）

《香港船頭貨價紙》顧名思義，是一份以船期、船務和貨價、行情為主的報紙。對於這家早期的華文報紙，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完全沒有提及，往後的有關中國報業發展史的中文研究著作也都完全忽視。倒是日本報史學家小野秀雄曾經根據流傳日本的《香港船頭貨價紙》的手抄本和有關“香港新聞”的記述，而推斷日本幕府末年發行的《官版香港新聞》原本之中文版為《香港船頭貨價紙》。（註9）他同時也推斷《香港船頭貨價紙》為《中外新報》的前身報。（註10）可惜的是，由於沒有《香港船頭貨價紙》的原報為證，因此並未引起中國報業史研究者廣泛的注意。

在小野先生的啓示下，筆者曾費下不少精力，探尋《香港船頭貨價紙》，現在終於如願以償，共覓見78份刊于1859年的該報。《香港船頭貨價紙》的發現，不但有力地證實了小野先生的推論基本上正確，而且也給我們提供了早期中文報紙的完整面貌，可以說是研究華文報業史不可多得的珍貴原始資料。

《香港船頭貨價紙》的第一個特徵是，它是以報紙形式出現，只出版一大張，兩面印刷。（註11）它打破了過去西方傳教士《察世俗每月統紀傳》創刊以來以書本方式為主的報紙形式，可以說是中文報業史上的一大突破。

該報的基本內容為：

第一頁：右上角為該“新文（聞——筆者按）紙館”的啓事，接著是兩三則“新聞”，餘者則為各種通告、廣告，以及“香港鴉片行情”等。

第二頁：右上方主要為“商船住來”的消息，其餘則為廣告及“告示”等。

兩頁共能容納四號字四千餘字，但由於廣告居多，新聞實際上只是保持在三、四百字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該報右上角的啓事是以“未士孖刺新文（聞）紙館”（註12）的名目發的，它清楚表明該報為《孖刺報》所有，其啓事內容如下：

「啓者，此紙你在孖刺處每日所印之新聞紙同館印刷，每逢禮拜二、禮拜四、禮拜六為期遍派香港各舖戶，每月收銀一大圓。如貴客有要事印落此紙內，務宜早一日走字通知未士孖刺便妥。印刷唐字價錢如左：一、凡每次落唐字者，五十個字已（按：“以”之誤）下，收銀一圓。倘五十個字已上，每字收銀一個先士。如欲再落者，每個禮拜照前一半算。如意者，祈請到本館便是。未士孖刺新文紙謹啓。」

這則啓事，除了說明該報系由《孖刺報》出版，如要刊登“通告”、“廣告”，應向《孖刺報》商洽之外，還告訴我們下列的事實：

1. 該報每周二、四、六出版。
2. 該報是以香港各舖戶為主要對象。

3. 該報在出版後，即遍派香港各舖戶。換句話說，該報採取派報制。

4. 該報報費每月一大圓。

至於啓事中詳列廣告之收費率，更足見該報對廣告的重視。實際上，如果刪除第一頁三、四百字的新聞，該報其實就是充滿“船頭貨價”及廣告、通告的報紙。如果把《香港船頭貨價紙》形容為中國的第一份商業報紙，也不為過。

1858年至1859年的《孖刺報》(Daily Press)在其"Terms for Advertising"檔中，指出該報同時出版“中文版”，並列明刊登中文廣告的費用。

該檔指出：

"There is a Chinese issue of this paper publish three times a week, in circulation amongst the natives, which will be found an excellent medium for advertising. For advertisement not inserted in English 50 characters or under one dollar, beyond that one cent 1 character the current week reckoned as one insertion" (註13)

這裡所指的"a Chinese issue of this paper", "three times a week" 以及刊登廣告的費用等，基本上皆與《香港船頭貨價新聞紙》的啓事相一致。由此可見它所指的"A Chinese issue of this paper", 非《香港船頭貨價新聞紙》莫屬。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知道，這份以船務、貨價及廣告等商業消息為主的華文報，與前述的《香港中外新報》，有著三個共同特徵：

1. 重視商業消息與廣告。
2. 是由《孖刺報》印刷與發行。
3. 同樣是每逢禮拜二、禮拜四、禮拜六出版及派送。

至於創刊日期，如果根據1872年5月4日（第二千二百五十六號）的《香港中外新報》來推算，《香港中外新報》的創刊號應在1857或58年間。

如果是以前者目前手頭上最早的《香港船頭貨價紙》（即己未年正月初一日，公元1859年2月3日，第一百九十七號）往後推算，則該報之創刊號，在未脫期的情況下，應該是1857年11月3日。Daily Press本身之創刊號為1857年10月1日（註14），該報之“中文版”如創刊於同年的11月3日，則意味著Daily Press在創刊後不久便籌辦中文報。

《香港船頭貨價新聞紙》與《香港中外新報》各方面之雷同與接近，無疑給報史學家提出了下列的疑問：

1. 《香港船頭貨價紙》會不會是《香港中外新報》的前身？
2. Daily Press會不會有可能同時出版兩份中文報？

針對第二個問題，答案應該是否定的，因為以當時的辦報條件（例如精通中英文的人材、廣告的收入以及有限的讀者群等），要維持一家中文報都不易，哪裡會妙想天開，同時辦兩份同樣是“二、四、六出版”的華文報？何況辦“周三次刊”的華文報，在當時還是前所未有的大膽的嘗試。

這樣一來，《香港船頭貨價紙》是《香港中外新報》之前身的可能性，應該較強。但在得出結論之前，先得解決兩者創刊日期之差距。據戈公振之考證，《香港中外新報》創刊於戊午年，即1858年（《中國報學史》之插圖也顯示該報“戊午年始創”），但《香港船頭貨價紙》創刊號，卻不可能遲於1857年11月3日。不過，正如上一節所考證一番，在1872年5月4日出版的《香港中外新報》，並未誌明該報創刊於“戊午年”，可見1912年《中外新報》版頭的誌明“戊午年始創”之字眼，是後來加上去的，未必一定完全可靠。因此，《香港船頭貨價紙》是《香港中外新報》的前身，是《孖刺報》(Daily Press)的“中文版”，創刊於1857年11月3日，每周二、四、六出版，以“商船、貨價、廣告等商業消息為中心，是中國第一份以新聞形式出版、兩面印刷的中文報”的結論，應該是可以成立的。

### 三、日本流傳的《官版香港新聞》與《香港新聞》

在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一書中，曾提到一份中國報史研究者迄今仍大大感迷惑，來歷不明的早期報紙——《香港新聞》。有關的敘述只有兩行：

「《香港新聞》為孖刺報(China Mail其實是Daily Press之誤——筆者按)之副刊。自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二年）起，凡八卷。專記船期、貨價、係純粹商業性質之雜誌。」（註15）

戈氏還把它列為“外報創始時期”的“中文雜誌”，給人的印象是，該報與香港的《遐邇貫珍》(1853-56)、《六合座談》(1856-57)等。同樣是屬於書冊式的刊物。

這也難怪，因為中文版根本找不到《香港新聞》這份刊物，戈氏的說法以及其《中國報學史》有關《香港新聞》的插圖，顯然是根據日本小野秀雄著作《日本新聞發達史》的資料。（註16）由於日文版《香港新聞》及《官版香港新聞》是書冊式，戈氏也推斷中文版的《香港新聞》是書冊式的“純粹商業性質之雜誌”。由於插圖的日文版《香港新聞》寫著“咸豐辛酉”，這也許是戈氏認為該刊物創自一八六一年的原因。（註17）

至於《香港新聞》出版八卷之說，這也是根據小野的著作。原來在當初，由於看到出版《官版香港新聞》的老皂館的廣告，曾提及出版“八卷”，小野便在《日本新聞發達史》書中，寫著“出版八卷”。但後來在日本國內，只能找到兩卷，因此小野相信「八卷」可能只是廣告，《官版香港新聞》實際上只出版兩卷。（註18）可惜的是，小野的更正，並未傳遞到中國的讀者。因此，直到今日，中國報史書籍仍然沿襲戈氏錯誤的記述。

其實，針對《香港新聞》，小野秀雄曾於1952年，在日本《新聞學評論》發表一篇題為“有關翻印新聞雜誌的原書”的重要論文。該論文根據下列事實，證明《香港船頭貨價紙》的存在及《香港新聞》的“文原書”為《香港船頭貨價紙》：

1. 《鈴木大雜集十三》一書中曾錄有與《官版香港新聞》內容相同的，但不加日文的句讀訓點的《香港新聞》自591號至668號，並有以下之說（註19）：

「右香港船頭貨價紙從五百九十一號辛酉七月初五至六百六十八號壬戌正月初六日總六拾紙。今後抄其新聞及上諭中足觀事情者而錄焉然而早卒讀了或有說要領事件者諄之。壬戌年二月望。 謀林鈴木豐大」

2. 小野個人藏有《香港船頭貨價紙》庚申四月十六日（即1860年6月5日）406號之抄本。

除此之外，《香港新聞》的一則“出賞帖”（“懸賞啓事”），曾提及“此為外國人遺失的金錢。如有拾到，請交予孖刺新聞館”，小野便據此推斷《香港新聞》為 Daily Press《孖刺報》之中文版。再根據出版日期之推算，小野即得出《香港中外新報》與《香港船頭貨價紙》（即《香港新聞》之“中文原書”）係同一系統報紙之結論。

以上是小野根據日本國內流傳的《官版香港新聞》（第一卷、第二卷，自591號至668號）、《鈴木大雜集十三》中收錄的《香港新聞》（自591號至668號）、小野私藏的《香港船頭貨價紙》（406號），而得出《香港新聞》、《香港船頭貨價紙》與《中外新報》的關係。

現在，我們根據新發現的中文報史料，即《香港中外新報》第二千二百五十六號（1872年5月4日）及《香港船頭貨價紙》第一百九十七號（1859年2月3日）至第二百八十五號（1859年8月27日）（其中有缺號），再回頭與日本方面的有關資料對照，比較和研究，可以發現到：

1. 《香港船頭貨價紙》第二百八十五號刊於咸豐九年七月廿九日（即1859年8月27

日)，由於每週出版三次，根據推算，其 406號，應刊於1860年6月5日，恰好與小野所藏的1860年6月5日的《香港船頭貨價紙》（406 號）手抄本相致，可見是同一報紙無誤。與此同時，如果是推算至 591號，《香港船頭貨價紙》之出版應為1861年8月10日，它與日本的《官版香港新聞》591號的出版日期相符合，足見《官版香港新聞》源自中文報《香港船頭貨價紙》一說無誤。

2. 在日文譯本《香港新聞紙》第一千零七十七號（甲子年八月二十二）中，曾有一則吁請唐人投稿的“本館字啓”（圖3A），其內容與《香港船頭貨價紙》幾乎每天出現的啓事完全相同，即

「啓者、唐人如有切要時事或得之目擊、或得之傳聞，不論何事，但取其有益於唐人，有合於同好者，均可攜至本館刻刷，分文不取，特此布聞。新聞紙館謹啓。」（圖3B）

足見《香港新聞紙》其實就是《香港船頭貨價紙》的日文版。

3. 《香港新聞紙》第一千零七十七號刊于1864年 9月22日，由於每周出版三次，到了1872年5月4日（即《香港中外新報》2256號），其編號應為2268號，與《香港中外新報》的2256號相差12號。然而，如果考慮到報紙脫期、休刊等因素（註20），《香港新聞紙》（即《香港船頭貨價紙》）與《香港中外新報》一脈相承，是同一報紙的看法，應該可以成立。

至於《香港船頭貨價紙》幾時改稱為《香港中外新報》，這個問題比較複雜。如果我們假設至日文譯本《香港新聞紙》的最後一期，即1077號為止，《香港船頭貨價紙》仍然還未換報名，則《香港中外新報》報名之使用，應該是在1864年 9月22日）以後的事。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在1865年 4月間，《香港中外新報》已經發行。因為在廣州出版的《中外新聞七日錄》於同治四年三月廿五日（1864年 4月20日），曾刊登對《中外新報》的評論。這段題為「香港中外新報論」的文章指出：

「香港中外新報原有益於商賈及庶民，惟因孖刺主人不識唐文，故不免多謬說，參入其間。今將其最著數件，擇出以證言……」

這段文字，說明兩點：

第一，當時《香港中外新報》已經存在。

第二，當時《香港中外新報》仍然還未擺脫《孖刺報》，它仍然是該報出版的“中文版”，雖然由於“孖刺主人不識唐文”，在某種程度上享有一定的自由。

與此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在1865年出版的《中外新聞七日錄》曾多次轉載《香港中外新版》的文章，也曾轉載當時租港的另一份中文報《近事編錄》（註21），但卻始終未曾出現《香港船頭貨價紙》。這其實也間接地提供我們一個事實：當時《香港船頭貨價紙》已不復存在，而改稱為《香港中外新報》。

#### 四、小結

綜合以上的考據，我們可在得出以下的結論：

1. 在中國報業史上，從未有過出版八卷的《香港新聞》這份“外報創刊時期”的“商業性雜誌”的存在。
2. 日文版不同版本的《香港新聞》（《官版香港新聞》、日文譯本《香港新聞紙》等）其實都是取材自《香港船頭貨價紙》。由於當時幕府當局要了解的只是外國的事務，因此，基本上日文版都不收錄有關船期、貨價、行情、告示（書刊廣告例外）。其情形就有如《官版六合座談》等刪除《六合座談》中有關事項，另行一冊一樣。也許是因為日文版已將《香港船頭貨價紙》中有關“船頭貨價”的內容刪除的緣故，日文版也將報告刪稱為《香港新聞》或《香港新聞紙》。
3. 日本版《香港新聞》及《香港新聞紙》皆為書冊式，但《香港船頭貨價紙》卻是以報紙形式，兩面印刷出版的第一家中文報。
4. 《香港船頭貨價紙》是《孖刺報》的中文版，創刊於1857年11月3日，每周二、四、六出版。內容以船期、貨價、行情、廣告等商業消息為主，也可以說是中國的第一家商業報紙。
5. 《香港船頭貨價紙》的主要讀者為商家，該報採取派報制，編派香港商店。
6. 《香港船頭貨價紙》後來改稱為《香港中外新報》，正確日期不詳，但很可能是在1864年或65年之間。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在1865年4月間，《香港中外新報》已經存在。
7. 《香港中外新報》繼承《香港船頭貨價紙》的傳統，十分重視商業新聞。在1872年5月4日之前，該報除了每逢星期二、四、六出版“新聞紙”，並登載行情消息之外，也在星期一、三、五發行“行情紙”。在5月4日以後，該報不再在新聞紙上刊錄行情新聞，而改以“另紙刊印”。這一來，該報等於每天（禮拜天除外）都印“行情紙”，“新聞紙”則照舊只在星期二、四、六出版。第二年，也就是1873年，《香港中外新報》終於發展成為完整的日報。

由此可見，《香港中外新報》的前身《香港船頭貨價紙》的創刊，比戈公振所說的1858年還略為早些，而是在1857年10月1日《孖刺報》創刊後不久的1857年11月3日。不過，它之銳變為日刊，是在報名改稱後甚久的1873年，而非戈公振所說的“旋改日刊”。從這角度來看，《香港中外新報》（準確的說，應該是指其前身《香港船頭貨價紙》被稱為“中國第一家以報紙形式出版、兩面印刷的近代化中文報紙”，應該是受之無愧。但能否被稱為“中國第一份中文日報”，卻有爭論之餘地。因為，如果單純考慮日刊出版日期，它之改為日報，比起上海的《上海新報》和《申報》，在日期上還略為晚些（註22）。

雖然如此，《香港船頭貨價紙》在1857年以“周三次刊”發行，以及後來的改題為《香港中外新報》，並發展為日刊的過程，無疑是給中國現代化報紙的發展提供了很好的經驗與模式。上海《申報》在創辦之初之所以要派人前往香港學習辦中文報的經驗，香港在當時之所以被認為華文報最先進的城市，莫不因為香港有《香港船頭貨價紙》、《香港中外新報》存在的緣故。

（日文版刊於日本《新聞學評論》三十五號1986年）

## 註釋

1. 也有人主張創刊於1860年。主要是歐美學者，例如：

Roswell S. Britton, *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1800-1912.*

(Shanghai, 1933. repr. Taipei, 1966) E.J.Eitel, *Europe in China. History of Hong Kong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1882.* Frank H. King & Prescott Clark, *A Research Guide to China-Coast Newspaper, 1822-1911.*

中國學者幾乎都採納戈公振的看法。只有少數的例外，例如香港華文報史研究者林友蘭就支持歐美學者的看法，理由之一是《孖刺西報》本身創刊於1857年，不太可能於第二年就辦中文版的《中外新報》。（〈近代中文報業先驅黃勝〉《報學》第四卷第三期第111頁台北1968年）。台灣學者賴光臨也贊同林的看法。（《中國新聞傳播史》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第52頁）。

2.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27年）第三章，外報創始時期）第10頁。

3.4 同上。

5. 《中國報學史》的《中外新報》電版插圖模糊，難以辨認出其出版日期，但從刊於

該報之廣告誌明為1912年，可以推斷出它係1912年出版的報紙。

6. 例如1966年台灣國立政治大新聞研究所出版，曾虛自主編的《中國新聞史》等。
7. 有不少研究者將它視為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的華文日報。例如，林友蘭在〈一百年前的華文日報〉一文中，就指出：「我們有理由認為，那份同治十二年歲次癸酉五月初十日（1873年6月4日、星期二）的華文日報，就是目前我們可能看到最舊的一份中文報。」（《報學》第三卷第八期台北1967年）。
8. 封面及第二卷各號都誌明為“香港新聞紙”，但第一卷各號卻是“香港新聞”。
9. 小野秀雄：〈有關翻刻新聞雜誌之原書〉《新聞學評論》第1號1952年。
10. 同上。
11. 到目前為止，有不少學者將1861年創刊的《上海新報》之採用“兩面印刷”，視為中文報業界的創舉。
12. 當時在香港的華人社會，經常將報館的主持人或主筆的名字，通稱為報名。例如The China Mail的主持人為Andrew Dixson，人們即將其報名稱為《德臣報》。同樣的，Daily Press的主筆是Y. J. Murrow，其報名即被通稱為《孖刺報》了。“未士刺新聞紙館”即為Messrs. Murrow的報館。
13. 有些廣告，也這樣地寫道：  
"Subscription, One Dollar Per Month....."  
"Subsequent Repetitions Half Price, Shipping Advertisement, No Extra Charge."
14. 戈公振，前引書第20頁。
15. 同上第5頁。
16. 17、18 小野秀雄前引論文第56-57頁。
19. 參看小野秀雄前引論文第60-63頁。
20. 1970年代的香港華文報章在農曆新年的前後往往休刊。例如，1874年2月4日創刊的《循環日報》有關創刊日期，及該報之考究，參看拙稿〈華人自辦最早成功的中文日報——《循環日報》日本立教大學《應用社會學研究》1987年 NO.28。在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874年 2月14日）的啓事中，即申明由於員工休息，將自農曆十二月二十日至正月四日暫停出版。由此可見，如果我們假設從1864年 9月22日至1872年5月4日的 7年多之間，《香港中外新報》由於員工休假，前後停止出版12期，是與當時之報紙之慣例相符合的。

21. 例如，在同治六年十月二十六日（1867年12月21日）的《中外新聞七日錄》中，就曾轉載香港《近事編錄》的文章。
22. 據曾虛日主編的《中國新聞史》，《上海新報》創刊於1861年，初為周刊，第二年改為周三次刊，1872年7月2日即以日刊之姿采出現。《申報》則創刊於1872年4月30日，初為周三次刊，從第五號開始改為日刊。 ■

